

陈福民:面对历史,文学虚构应克制自由

打开《北纬四十度》,顺着文学评论家陈福民的目光向历史深处望去,我们停驻在沿北纬四十度而展开的长城内外。

在它的南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在它的北方,飞马驰骋,自由奔放;隔着这条地理带,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加入着对方。中原定居的汉民族与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围绕着北纬四十度进行反复争夺。北纬四十度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直接参与了数千年来南北双方的摩擦和交流,也见证了中国古代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和文明形态的成型过程。

围绕以长城为标志的“北纬四十度”地理带,陈福民重新审视了有关赵武灵王、汉高祖刘邦、李广、卫青、霍去病、王昭君、孝文帝拓跋宏、安禄山等历史人物的故事,并写下了他关于民族冲突与融合等方面的历史散文作为专栏文章首发于《收获》杂志,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今年集结出版。

历史故事带来的困惑和思考,是陈福民写作的直接动因,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得应有的光荣与尊重。陈福民观察到,一些文学写作者通过“偷懒式”的拿来主义去历史中抓取人物和故事,以“文学虚构”为名扭曲已有确切根据的史实来编造自己的小说。因此,在自己的写作中,陈福民格外注重历史真实,对历史材料保持敬畏,他尽可能地将“二十四史”中与文中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又摸索了一遍,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

与此同时,陈福民也希望带领读者逃离以道德审判为中心的传统历史文学叙事。很多公众读者的历史观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中建构的,他们只看到了道德动机,却忽略了背后历史运动的复杂动机与能量。“天下皆知的杨家将故事,以‘忠奸模式’建构起了民间的大宋历史,各种道德楷模与人渣恶棍的‘忠奸’戏码取代了辽宋、金宋之间的历史博弈。过瘾是过瘾,但这与历史毫无关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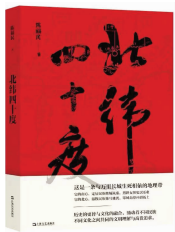
现代快报+记者 张垚轩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福民

学者、批评家。先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学位。1996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文学评论集《阅读与批评的力量》、历史文化随笔集《北纬四十度》等。目前致力于边疆史地研读与写作。



《北纬四十度》
陈福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始终在世界中,但能否看见世界是另一个问题

读品:最初如何关注到北纬40度以及围绕这条地理线所发生的历史故事?

陈福民:地缘方面的便利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我出生并生活在北纬40度线,北方的深刻影响是全方位的。我的家乡地处战国时期的燕国,很早就接触到燕长城,后来更多机会看到明长城。这种具体的物象,激活了我阅读历史时与长城有关的各种记忆。一团乱麻一样的故事、人物和情节像一团火充盈心中燃烧又理不出头绪。2014年秋天我自驾去漠河,回来之后在某汽车网站的用户板块写了一个长帖,题目是无意中起的,大约为《出发,向着北纬40度以北》之类。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北纬40度线真的是有名堂的,它与长城重叠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条地理线关涉着历史、民族、地理等等太多的东西,值得认真对待。

读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匈奴单于白登困因汉高祖,卫青、霍去病击退匈奴,昭君出塞,刘渊永嘉之乱,孝文帝迁都,安史之乱,燕云十六州民族融合,书中提及的历史事件均围绕“民族竞争与融合”这一主题,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你在《北纬四十度》中观察与叙述“民族竞争与融合”的角度相较以往的研究有哪些不同之处?

陈福民:这个问题之所以给人以一种“老生常谈”的印象,在我看来并非因为它不是事实,而是以往比较多停留在政治层面去陈述未做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官修历史肯定站定中原汉族中心主义,因此常有以文明优越感去表述历史上的民族交往或者冲突。这个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要求古人也有今天理解民族历史问题的现代立场。事实上,文明史意义上的交往融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时候未必是以我们通常理解的“两情相悦”“一派祥和”的方式来进行。我们所嘉许所倡导的“和平友好”,是融合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个结果达成之前,其进程充满了竞争与冲突。

读品:你曾提及希望通过《北纬四十度》达到“看见世界,看见中国”的目的。

陈福民:中国传统历史的天下观曾视自己为世界中心,在农业文明发展最早、政治制度和经济成果最为灿烂辉煌的上古时代,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个事实。相对说,中国历史书写到了比较晚近的时代才对世界有了自觉意识。中国始终在世界中,这是事实,但能否真的看见世界则是另一个问题,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我希望《北纬四十度》能够加入到“看世界”的行列中尽绵薄之力。

读品:书中主要的历史现场,你都曾去过实地,实际考察的经历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收获?

陈福民:实地考察作为社会学“田野”工作的必要功课,不会因为你是文学家就变得很有诗意之类的。广袤而开阔的北中国大地一如既往如它们曾经所是的样子沉默不语,而我需要参照历史地理学的一些规范要求去感知和触摸它们。以“长城”为例,就单纯技术观点看,长城的修筑史及其材料、纬度的变化是饶有趣味和启发性的。比如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北长城和燕长城,由于国家的生产力不足、建筑材料限制等因素,与我们常识所及的明长城有着天壤之别。明长城重要的关口那种坚实雄伟的包砖结构,在燕赵长城乃至秦汉长城那里是没有的,它们往往都是因陋就简的碎石堆砌,或者状如“干打垒”的泥草结构。今天河北崇礼的北齐长城是碎石块堆砌的,而玉门关一代的汉长城遗址则是纯粹的泥草堆积物。很多事物,如果只停留在纸面上不可能得到应有的知识。

不要用道德动机遮蔽历史运动的复杂动机与能量

读品:在书中你提出这样一个现象,很多公众读者的历史观并不是通过历史学习去获得,而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中完成。这两种途径的关键区别在哪里?

陈福民: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看待任何问题时,都切记不要用道德动机去替代乃至遮蔽历史运动的复杂动机与能量。一个为恋爱失败而痛不欲生的人,经常说一句话“我都爱你爱到这个程度了,你还不爱我么?”他/她们不太明白的一个道理是,事情的结果是不可能用你的动机正当与否去决定的。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恋爱永远不会成功。历史问题的严酷性要比恋爱来得更真实更复杂,万不可以个人道德善恶去解释历史。不排除有些时候个体机会在某种细节问题上能让你感受舒服一点,但须知历史动机是由其背后极端复杂的政治经济能量集合而成,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不管他历史故事讲得多热闹,基本都是历史盲人。中国的民间历史故事讲述很多这种盲人传统。天下皆知的杨家将故事,以“忠奸模式”建构起了民间的大宋历史,各种道德楷模与人渣恶棍的“忠奸”戏码取代了辽宋、金宋之间的历史博弈。过瘾是过瘾,但这与历史毫无关系了。

读品:对于李广这个历史人物,你有着与司马迁截然不同的看法:李广缺乏必要的军事操练和纪律约束,不是一个好将领。在写作中,写作者不可避免地会代入自己的经历和价值观,如何避免个人化书写带来的偏颇?

陈福民:写作者个人的价值立场在书中如何安放如何呈现,是个高难度动作。个人的主观情感和立场处理不好,往往会干扰历史事件与人物在具体环境具体语境中的客观性。这些方面,无论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不能回避。相对说来,文学享有的自由度可能更高一些。可是能“自由”到

什么程度呢?这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文学家在创作中改变、扭曲已有公认结论的历史事实的方法,是很难接受的。

读品: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跨界进行历史题材的研究与书写,期间遇见了哪些难点?

陈福民:困难很多。首先是典籍、史料的阅读和占有,这个工作量极大,我需要把“二十四史”中涉及到“北纬40度”问题的材料都梳理一遍。比如在撰写安史之乱这一章时,仅仅靠一本《安禄山事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同时,当代学者有关“粟特学”的专著也要读,如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和荣新江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这个工作虽然繁巨,毕竟还是有迹可循的,更困难的在于《北纬四十度》的题材广泛涉及民族学内容,很多民族学材料对民族语言学的工具性要求很高,而我完全不具备这个能力,只能通过汉文典籍或者译作去解决问题。这期间,肤浅乃至舛误是很难避免的。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也令我烦恼,写作中遇到了太多的“北纬40度”线上的地名,而这些地名在两千年前的行政建制流变中经常变动,有些从一开始就存有异议。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为此我借助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等很多工具书,还是不能完全解决。

应该说,《北纬四十度》的写作,在文学功夫之外还要做更多的功课,对写作者的知识素养的基本门槛有严格要求。

理想的文学应该“有文学的品行,有知识的容貌”

读品:在关于《北纬四十度》的评论文章中,贺绍俊提及某些历史文化散文的泛滥的弊端,“这类散文的问题要么是历史肢解化,即只是从历史中攫取一些片段然后任意发挥,缺乏对历史的整体观照;要么是过分追求文学性,使历史本真的面目被虚构、抒情、辞藻所遮蔽。”因余秋雨《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等书籍,历史文化散文一度受到读者以及评论界的关注,虽然褒贬不一,但不能否认其巨大的影响力。你如何看待当下历史文化散文的书写?历史文化散文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陈福民:贺老师对“某些历史文化散文的泛滥的弊端”有清醒的见解,对此我完全同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历史文化散文”都程度不同存在着贺老师所批评的现象。应该说,余秋雨先生通过《文化苦旅》等作品所开创的这条写作路径,对于整个中国散文写作是一个巨大的启示性的推进。在他之前,散文更多是被“假大空”的“任意发挥”所笼罩,或者过度追逐抒情和修辞。余秋雨凭一己之力打开了散文写作的历史之门,这个肯定是有文学史地位的。至于后来的评价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我觉得也很正常。

我特别同意贺老师对“从历史中攫取一些片段然后任意发挥,缺乏对历史的整体观照”的批评。因为历史题材有自己的长时段客观性,一个小片段很难构成散文写作的基调和逻辑,因此那些发挥就相对容易零打碎敲天马行空首尾难顾了。虽然文学写作赋予作者选择题材的绝对自由,但不同的题材始终有自己的“规定性”。如果不愿意面对这种规定性,那又何必选择历史题材呢?

综上,历史文化散文可能对写作者的历史耐心有一定的要求。

读品:推荐一些你认可的历史小说。

陈福民:应该说,近些年的历史小说要比过去提高了很多,也有不少成功的作品。但我还是不推荐了,与这些小说相比,我宁可去读一点历史。

大读家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